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3 月 24 日上午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6 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演讲时指出，中方愿将“一带一路”的倡议与地区国家及区域组织发展战略对接，打造规划衔接、生产融合、协同跟进的地区发展新格局；支持互联互通、产能合作等项目，让地区人民共享融合发展的红利。的确，亚洲是全球最具活力的地区，但依然有痛点，不联不通就是痛点，通过“一带一路”的五通建设，亚洲以及世界的共同体前景将更加聚化，即以“互联互通”激活“新未来”。今天，“一带一路”需要更多的标志性项目落地，需要实现硬联通与软联通的结合，需要以通心工程解决“信任稀缺”的问题。虽然叫亚洲论坛，但博鳌的关注点与影响力已经遍及全世界。

中国的聚光灯效应在放大

笔者最近先后赴澳大利亚、捷克、意大利、英国等西方经济体调研“一带一路”。总体感觉是，西方国家高度关注中国的发展，认为中国拥有全球角色。具体来说，对中国的赞誉与期望集中在几下几点：中国是国际社会的核心国家，是全球治理的支柱国家 (pillar)；对中国预见以及规划未来的能力印象深刻，认为中国领导层有很强的顶层设置能力；在全球化时代，各个国家都共享着中国发展的成就，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很大，中国脱贫的规模和难度是世界上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希望加强同中国的知识流动，加强人文交流。

与此同时，西方经济体特别是欧洲对目

前的发展状况有消极情绪，认为自身的竞争力在不断下降。笔者在调研过程中经常听到如下的表述：欧洲地区的危机是长期性的，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等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欧洲地区的危机是系统问题，而不仅仅是政策问题，因此要系统性地改造，而不是技术性地改良。在经济合作方面，相关国家希望在环保、现代农业、高科技、医疗保健、社会政策等领域加强同中国的合作，主动将其规划对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在亚洲，周边国家的领导人对中国经济多持积极认可态度。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增速减慢，但依然超过诸多西方经济体。亚洲诸多国家希望利用博鳌论坛以及“一带一路”把握住中国机遇。例如，中澳自贸协定的签署，对中澳关系影响很大，澳方认为中澳关系处于黄金期，两国在投资、贸易以及人文交流方面非常活跃。很多澳大利亚企业正在思考，高工资但高素质的澳大利亚人如何增强国家竞争力，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打开中国市场。澳洲的传统合作伙伴是欧美，现在经济上向北看，集中精力开拓亚洲，特别是中国。在调研期间，澳方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一带一路”包不包括澳大利亚，“一带一路”对澳洲和亚太关系意味着什么，“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关系如何定位，等等。这一方面反映出，澳方高度关注中方倡议，但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基础薄弱（比如，认为“一带一路”的核心是基建项目和输出过剩产能），另一方面也说明我方工作力度不够、针对性不强。与国内不断有智库、商会、媒体去欧洲、中亚等地区宣讲、推介“一带一路”项目相比，我们事

实的忽视了澳洲等亚太国家在“一带一路”中的优势和机遇。

“激活”要先打通“痛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痛点可以概括为：在经济上，一些经济体逐渐摆脱了持续多年的衰退而恢复增长，但深层次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前景仍不容乐观。首先，投资不足的状况难以在短期内改变。同时，失业率高居不下，青年失业率更是惊人，直接影响到社会稳定。在政治上，有些国家深陷危机，希望加速振兴，但由于繁琐、低效的制度限制，无法迅速采取行动。虽然启动了改革方案，目的是简化立法程序、提高国家效率。然而，相关改革牵涉的党派与利益主体众多，阻力巨大。在外交上，保守主义情绪相互传染。诸多沿线国家的民众目前最关心的议题是就业、卫生、移民、养老金等，外交政策的内向性更加明显，如英国启动“脱欧公投”就是具体表现。最后，难民、移民问题同民族、宗教问题相互交织，人们普遍缺乏安全感。

在此背景下，博鳌论坛以及“一带一路”的受欢迎，是全球“灰暗背景”的一抹亮色，甚至可以预言全球会逐步迈入“新亚欧大陆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就是，国际权力重心逐渐向东方转移，相关国家主动加强同中国、亚太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双边关系以及多边制度安排，安全、经贸等硬实力积极同文化、文明等软实力互联互通。

“博鳌论坛”之后的三大工作要点

第一，除经贸合作外，要不断加强人文交流，要努力推动国家之间的文化和教育合作。在“一带一路”沿线上，有越来越多的学校开设中文课程，最近 BBC 的纪录片《中华的故事》就非常受欢迎，每周有数百万英国人在电视机前观看。澳、英、德等西方国家多次表示，希望加强同中国的人文交流，特别是在职业教育培训方面，他们有优势，愿意在工程、设计以及医疗保障等领域

里的很多信息都集中在大数据里了。人们的生活、旅行等消费习惯，工作以业务往来等习惯和因此而形成的信用，都包含在这个大数据中。当然，这些数据未必真能够代表人们的信用。但有了这些数据，人们的确可以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来佐证其主观信用价值。每个人都通过客观个人行为的数据来认识别人，但往往是通过主观体验来认识自己，互联网的大数据搜集客观发生的数据，更重要的是随时搜集你的主观体验后发生的新数据。所以，它又是亲近主观性的客观数据。

如果监管的依据仅是所谓的局部的或者宏观的外在数据，那么就需要小心了。因为这个数据是去掉结构之后的冰山之角的数据，而且往往是已经去掉很多主观性的客观数据，也可能造成用这个已经雪崩的冰山去测量另一个稳固的泰山。如果依据这些看起来靠谱但实际上已经大大简化的数据，并且通过具有自身金字塔式命令等级结构的官僚结构来提出、制定并进行实施和自我评估的所谓监管，来制定传统金融那样的严格准入、高度管制，稍稍有活力，然后出点问题就来个治理整顿的监管系统，可以预计，这个监管系统不是把互联网金融消灭了，就会是礼仪上进行些象征性的监管，但实际上互联网金融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其区别是互联网巨头们支付点管制的成本，同时获得一些因监管而来的垄断利润。当然，既然有被监管身份的保护，往往就会做得更大胆一些，互联网金融也因此会有更少的内在风控必要，而在结构上认为累积并放大风险。

所以，强化监管，而且实施全覆盖监管，保护投资者利益，说起来是很好的，但

“激活”要先打通“痛点”

加强合作。目前，中国留学生正成为西方国家大学越来越重要的收入来源。在英国，其外交国务大臣雨果·施维尔明确指出，提高中英民众的相互了解对“黄金年代”的维护非常重要。目前，英国政府开始加强有关中文的语言学习投资，鼓励更多的英国学生学习中文。

虽然充分的语言、旅游、文化等人文交流未必能够使得政治问题迎刃而解，但毕竟人文交流是“通心工程”。1616 年，东西方戏剧大师——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同年仙逝。2016 年是两位文学巨匠逝世 400 周年，中英两国可以共同举办纪念活动，如推动《牡丹亭》等传世名著在英国进剧场、进课程、进社区，举办汤显祖-莎士比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等，以此推动两国人民交流、文化交融、加深相互理解。

第二，如何使博鳌论坛的效果可持续，值得认真研究。笔者非常赞成有些专家提出的“离岸外交”概念，即借助外部资源鲜活地讲好中国故事。一是充分利用驻外华人华侨资源进行外宣传播。华人华侨中一些精英已融入当地社会，谙熟所在国的语言文化，积累了广泛的人脉资源。同时他们十分了解祖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是沟通中外的高效桥梁。例如，《中国新闻周刊》国际版等媒体在这方面做了较有成效的尝试，聘请的工作人员多是华人，他们具有在英国广播公司 BBC 等主流媒体的采编管理经验，伦敦、北京两地采编中英、中欧重大新闻，本土操作，高端精准发行。其次，在投射文化软实力方面，除了支持孔子学院之外，可借鉴日本和台湾的经验，适当考虑出资在欧洲高校设立“特定教席”。比如，英国牛津、剑桥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产生了很多世界知名的学者和各类诺贝尔奖获得者，可以鼓励和支持一些中国机构和企业出资在这些高等学府特设“讲习教授”或冠名，加强和扩大与中国相关课题的研究，他们从事学术活动和发表文章时，都会自然地产生学术与社会影响，如同行走的中国名片。此外，根据英国牛津、剑桥等已有的成功经验，可以鼓励和支持中国机构和企业特设或冠名奖学金、楼宇、甚至院系，如剑桥大学的贾吉 Judge 商学院，牛津大学的赛德 Said 商学院以及路

以“一带一路”激活“新未来”

■赵磊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

实上忽视了澳洲等亚太国家在“一带一路”中的优势和机遇。

“激活”要先打通“痛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痛点可以概括为：在经济上，一些经济体逐渐摆脱了持续多年的衰退而恢复增长，但深层次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前景仍不容乐观。首先，投资不足的状况难以在短期内改变。同时，失业率高居不下，青年失业率更是惊人，直接影响到社会稳定。在政治上，有些国家深陷危机，希望加速振兴，但由于繁琐、低效的制度限制，无法迅速采取行动。虽然启动了改革方案，目的是简化立法程序、提高国家效率。然而，相关改革牵涉的党派与利益主体众多，阻力巨大。在外交上，保守主义情绪相互传染。诸多沿线国家的民众目前最关心的议题是就业、卫生、移民、养老金等，外交政策的内向性更加明显，如英国启动“脱欧公投”就是具体表现。最后，难民、移民问题同民族、宗教问题相互交织，人们普遍缺乏安全感。

在此背景下，博鳌论坛以及“一带一路”的受欢迎，是全球“灰暗背景”的一抹亮色，甚至可以预言全球会逐步迈入“新亚欧大陆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就是，国际权力重心逐渐向东方转移，相关国家主动加强同中国、亚太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双边关系以及多边制度安排，安全、经贸等硬实力积极同文化、文明等软实力互联互通。

“博鳌论坛”之后的三大工作要点

第一，除经贸合作外，要不断加强人文交流，要努力推动国家之间的文化和教育合作。在“一带一路”沿线上，有越来越多的学校开设中文课程，最近 BBC 的纪录片《中华的故事》就非常受欢迎，每周有数百万英国人在电视机前观看。澳、英、德等西方国家多次表示，希望加强同中国的人文交流，特别是在职业教育培训方面，他们有优势，愿意在工程、设计以及医疗保障等领域

互联网金融监管的逻辑

■毛寿龙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这说明，互联网金融不能在传统高度管制的金融体系里去发展，而是要在新的荒野之地，重新开辟一个天地。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意外催生了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也恰恰是监管部门的迟疑和没有很好的监管手段，同时也需要互联网金融促进 GDP 高速增长，让互联网终于获得了这几年自由发展的宝贵空间。

不过，监管部门开始关注到互联网金融出现的问题。有人认为，互联网金融首先是金融，金融是有风险的，而且金融风险有很强的外溢性，做不好，会影响其他行业，而互联网会放大金融固有的风险，所以比传统金融的风险还要大。所以，要对互联网金融进行全覆盖的治理整顿。要进入有门槛，运行有监督，经营范围有边界，客户资金要安全，投资者要有健全的保护机制等。

这些说法看起来似乎是正确的，没有任何可反驳的余地。因为谁想要互联网金融没有门槛，不管阿狗阿猫谁都可以进去的呢？谁想互联网金融运行是缺乏监督的呢？谁想着互联网金融的经营范围没有边界呢？谁想着让客户资金更充满风险，很不安全？谁想着会让投资者置于危险中呢？谁都不会这么想，大家都会想着要让互联网金融只有高人参与、其运行有严格的监管，有明确的边界，而且客户资金笃定赢利，没有危险。大家的想法看来都是一致的，但区别在于怎么想。

如果这种想法仅仅是小范围的“原始秩序”的想法，那就不必要这么想了，因为这些想法已经在互联网金融里了。因为互联网用的是大数据，它已经把人们日常在原始秩序

“激活”要先打通“痛点”

做起来就未必容易了。更何况监管保护到位，也只会刺激互联网金融更为冒险的行为，反而扩大了其风险。就像安全，自行车，摩托车和汽车挤在一起，反而大家，发生事故也就刮蹭而已。而一旦全封闭，只让高速小轿车上去，大家都放心高速运营，反而容易发生大事故。

所以，正确的选择应该是，互联网金融任其自由发展，风险自负，让市场自身产生复杂但有效的风控系统，即使有风险，也能够得到分散化的处理。至于规则层次的问题，市场内生的边界和规则，会逐步被认识到，并被挖掘出来。在这个过程中互联网的风控部门和规则制定部门，会有主导的作用。而政府，则要表现得谦虚一些，不能把传统金融的规则拿过来，也不能把这些刚刚发掘出来的新金融规则拿过来当作自己的发明，更不能用现有的官僚化的管理去实施这些已经过时的规则，包括刚挖掘但也很可能很快过时的规则。

现在，政府已经出台了一些规则性文件，比如《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等。估计还有更多的指导意见和暂行办法推出来。希望这些意见和暂行办法是建议性的，而不是强制性的，最好是暂行的。很多互联网金融的企业家告诉我，现在政府出台文件不再单方面闭门运作，已经开始广泛征求企业家的意见。这很好，值得鼓励。因为互联网金融，真正的主角是企业家。政府不应动不动拿过时的问题和被淘汰的企业说事，动不动要拿权力来整理整顿的官员。

(FT 中文网)

加强合作。目前，中国留学生正成为西方国家大学越来越重要的收入来源。在英国，其外交国务大臣雨果·施维尔明确指出，提高中英民众的相互了解对“黄金年代”的维护非常重要。目前，英国政府开始加强有关中文的语言学习投资，鼓励更多的英国学生学习中文。

虽然充分的语言、旅游、文化等人文交流未必能够使得政治问题迎刃而解，但毕竟人文交流是“通心工程”。1616 年，东西方戏剧大师——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同年仙逝。2016 年是两位文学巨匠逝世 400 周年，中英两国可以共同举办纪念活动，如推动《牡丹亭》等传世名著在英国进剧场、进课程、进社区，举办汤显祖-莎士比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等，以此推动两国人民交流、文化交融、加深相互理解。

第二，如何使博鳌论坛的效果可持续，值得认真研究。笔者非常赞成有些专家提出的“离岸外交”概念，即借助外部资源鲜活地讲好中国故事。一是充分利用驻外华人华侨资源进行外宣传播。华人华侨中一些精英已融入当地社会，谙熟所在国的语言文化，积累了广泛的人脉资源。同时他们十分了解祖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是沟通中外的高效桥梁。例如，《中国新闻周刊》国际版等媒体在这方面做了较有成效的尝试，聘请的工作人员多是华人，他们具有在英国广播公司 BBC 等主流媒体的采编管理经验，伦敦、北京两地采编中英、中欧重大新闻，本土操作，高端精准发行。其次，在投射文化软实力方面，除了支持孔子学院之外，可借鉴日本和台湾的经验，适当考虑出资在欧洲高校设立“特定教席”。比如，英国牛津、剑桥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产生了很多世界知名的学者和各类诺贝尔奖获得者，可以鼓励和支持一些中国机构和企业出资在这些高等学府特设“讲习教授”或冠名，加强和扩大与中国相关课题的研究，他们从事学术活动和发表文章时，都会自然地产生学术与社会影响，如同行走的中国名片。此外，根据英国牛津、剑桥等已有的成功经验，可以鼓励和支持中国机构和企业特设或冠名奖学金、楼宇、甚至院系，如剑桥大学的贾吉 Judge 商学院，牛津大学的赛德 Said 商学院以及路

中国力推电网跨境互联计划

中国国家电网负责人 3 月 29 日在启动跨境电力连接计划时称，中国在远程、超高压电力输送线方面的投资计划将为中国电力出口到远至德国的地区铺平道路。

向中亚、甚至更远的地区出口电力，与中国“一带一路”的抱负（在面临国内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对外出口工业过剩产能和工程技术）一致。该计划将允许中国在新疆等边疆地区的巨大水电站大坝、燃煤电厂和风力发电场向海外高价市场出售电力。“一带一路”是指从亚洲通往欧洲的陆上路线，而“一路”怪异地指的是途经印度洋的海上路线。

有关出口电力的讨论对中国来说可谓局面大逆转，直到 2004 年中国的制造业腹地还遭遇轮流停电的境况。但是，10 年来中国在电力上的巨大投资、以及预计将在未来 10 年投入运行的很多大坝、核反应堆以及燃煤电厂的建设，意味着中国面临电力日益过剩的情况。国家电网公司董事长刘振亚向记者表示，新疆能够以德国目前电力成本的一半向该国输送风力和热力所生产的电力。“那里有太多资源，但是没有市场。我们需要向外寻找市场。”

从中国与中亚的边境附近的新疆绿洲城市喀什到柏林的直线距离，只比从喀什到中国金融中心上海的距离多 400 英里。刘振亚称，其他潜在市场包括巴基斯坦、印度和缅甸。不到 5 年前，缅甸取消了一项原用于向中国输送电力的大坝建设计划。如今，中国西南部大坝过多，中国成了寻求电力出口的一方。

刘振亚全力支持超高压输电，这种技术使中国可以建设与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的电力需求中心相距遥远的大型能源项目。这使得刘振亚在反对大型煤炭开采及建设大坝的环保人士眼中成为了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一些电力行业高管认为，国家电网对超高压的注重，使一些距离人口中心较近的较小但效率更高的项目成为牺牲品。

同样是在 3 月 29 日，国家电网与韩国电力公司和日本软银签署了推动东北亚互联电网发展的合作备忘录。

“激活”要先打通“痛点”

透 Reuters 新闻研究所等。目前，可考虑在这类高校中由企业或个人出资设立“丝路”奖学金、“丝路”教席、“丝路”研究所等。

第三，要使“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真正落地。2015 年的博鳌论坛期间，《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文件出台，完成了顶层设计。2016 年，要以博鳌论坛为契机，使“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真正落地。目前，英国的北方经济引擎规划与“一带一路”对接的基础较好，可率先打造成为中欧合作的标志性项目。英国欢迎中国投资，尤其是到英格兰北部和北爱尔兰等地区投资。英国北方经济引擎规划的出发点：使英国的南北方地区发展更为均衡、实现区域内核心城市的经济联动，等等。相关做法有：1、区域内的城市（曼彻斯特、利兹、利物浦、谢菲尔德、纽卡斯尔）启动共同经济战略并进行联合投资，以改善这些城市、城镇及其港口之间以及城市内交通运输网络的连通性；2、相关城市组成“超级”经济体，打破现有各城市独立运营的状态，创造充分的商业机会，实现智慧城市；3、区域内高校、智库、科研院所组成学术联盟，对相关议题进行联合服务；4、政府的作用是为企业提供优质的服务与支持，增强区域内企业对接国际市场的便利性；5、充分的连通性与便利性有利于提高该城市群的国际竞争力，不断吸引优秀人才以及创新型全球企业入驻该区域。

上述内容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长江经济带建设有启示意义。此外，英国北方经济引擎规划区域在能源、生命科学、医疗保健、先进制造业以及物流等行业具备雄厚的实力，同时，该规划涉及价值 240 亿英镑的投资项目，覆盖从住房到能源、从科学到航运的诸多行业，应鼓励我国企业以此区域为突破口，由此积累进入西方高端市场的资质条件以及人文经验。

总之，博鳌论坛以及“一带一路”必将为全球经济注入新的发展动力，使各国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积极探索合作之道，在确保各自国家拥有竞争优势的同时，夯实共识基础，在政策上逐渐采取去除贸易壁垒的措施，加强互联互通，增强彼此的开放力度。

(FT 中文网)